

中华春秋

先秦税收思想的三个特点



□ 方宝璋

先秦税收思想是中国税收思想的源头，对古代税收思想影响深远，甚至对当代税收制度也有历史借鉴意义。

通过税收促进生产发展

先秦时期，人们已经知道通过税收性的政策工具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调节、控制。如《周礼·司徒下》规定：宅旁不种桑麻之家，就必须向国家额外交纳“里布”；某家有田不耕种，任其荒废，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“屋粟”；某家如有劳动力而任其游手好闲，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赋税或服徭役。《周礼》设计的国家治理思想倾向于干涉主义，但与先秦法家的干涉主义思想又有明显不同，除主张采用行政、法律手段外，也重视通过经济手段，如赋税等财政性政策工具对国家进行治理。

秦国的商鞅也很懂得利用税收性政策工具来推行他的富国强兵国策。他以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手段，引导民众从事农业，其鼓励限制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：其一，利用国家租税政策使民众积极从事农业。商鞅主张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实行较轻的税率，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。其二，商鞅主张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，迫使他们务农。他认为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，使他们缺乏粮食，就会迫使他们从事农业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，农田就被开垦的越来越多，农业也就发展了。其三，商鞅还用加重商人赋税、徭役的办法来抑制商人。他认为，关市征税高了，经商无利可图，农民就不会弃农经商，商人也对经营商业产生怀疑，那从事农业的人就多了，农田必定会开垦得越来越多。商鞅还主张对出售酒、肉征收重税，借此来打击酒、肉商人，并使农民因酒、肉价格高而少饮酒作乐，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农业生产。

《管子·国蓄》反对政府向民众征收太多的赋税，除担心遭到民众的反对外，更考虑到过多赋税会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。例如：征收屋税会使人们毁坏房屋；征六畜税会使人们屠杀六畜，不再饲养；征田亩税会使人们不肯耕种，更不用说开垦荒地；征收人头税会使人们隐瞒人口；征收户口税会使穷人依附于大户。

藏富于民，安定社会

《老子》一书没有正面提出薄税敛的主

张，但从老子对厚敛进行的猛烈抨击，斥责当政者如同大盗可以看出，他是反对厚敛而主张薄税敛的。他认为：“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”民众遭受饥饿，是因为政府征收粮食税太多的缘故。

孔子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”的思想，已较为明确地指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，在一定程度上把富民和富国家联系起来。孔子认为，当时妨碍民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赋税负担过重，因此他提出“薄赋敛则民富”，反对重税，在税率方面坚持“彻”法，十分取一。孔子的薄赋敛思想对减轻农民负担，缓和社会矛盾，维护国家和谐安定，具有积极意义。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，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容置疑的“圣训”，是历代王朝施行仁政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政策措施。

孟子薄赋思想的原则是“取于民有制”，就是国家的赋税征收必须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能由统治者任意而为。孟子遵循孔子的主张，认为什一税制最为适中。他既不赞成重于什一之税，但也反对轻于什一之税。孟子在《孟子·告子下》篇中把轻于什一之税视为大貉、小貉之类少数民族的税制，这会使城郭、宫室、宗庙祭祀、政府机构等都因无经费开支而不存在了。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。反之，如重于什一之税，那就像夏桀一样重敛百姓，使他们无法生存，揭竿而起。以后，儒家把什一税制思想奉为经典。

荀子继承了孔子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”的思想，主张藏富于民：“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宦嫖，实府库。”基于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，荀子同孔子、孟子一样，主张轻征农业税，不征关市商税，开放山林泽梁不收税，少征徭役。总之，薄税赋，放水养鱼，减轻农民的负担，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的时间和财力发展农业生产，让老百姓先富起来，繁荣社会经济，那国家就有充足的税源，不言而喻，国家肯定也会富起来。在征税的具体方法上，荀子则主张删繁就简，采取“宽税简易”的办法，以减少征收活动对农业生产时间的影响。

《管子》也主张薄税敛，认为如对人民征收重税，会造成两个方面负面影响。其一，《管子·治国》指出：人民赋税负担重，征税暴急无时，加上高利贷盘剥，造成农民的贫困。其二，《管子·权修》指出：赋敛厚，使“民力竭”，破坏农业生产，并且造成“下怨上”，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，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巩固。因此，国家税收必须“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，国虽小必安；取于民无度，用之不

止，国虽大必危”。

《管子》多处阐述“藏富于民”的思想，认为“民富君无与贫，民贫君无与富”。取民之所以要求要适度，是因为生产者被看作是税源，如果取民无度，将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中断，从而使税源枯竭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《管子·五辅》主张“薄赋敛，毋苛于民”，体现了取民有度的财政收入原则。所谓薄征，实质上是要求税额不要超过纳税人可以容忍的限度。《管子》一书中多处提到减轻各种税率，虽然各种规定的税率不尽一致，但都主张轻征。如一种是主张“田租百取五”，另一种则主张“二岁而税一，上年什取三，中年什取二，下年什取一，岁饥不税”。

韩非与先秦其他思想家一样，主张薄税敛。但是他的薄税敛的理由与别人则有所不同，认为农民辛辛苦苦耕作却要承担重税，而学士靠君主供养还能免税领取赏，这太不合理了，因此君主要求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说话抱怨，是做不到的。其实，韩非的这一理由是带有片面性的，学士从事治理国家、文化教育等是脑力劳动，并非无所事事白白靠君主供养。韩非薄税敛的另一理由是切中当时重赋敛的弊端，即一些奸邪之臣为了邀宠获赏，迎合君主奢靡玩乐之心，不惜用重敛的收入来满足其纵欲之需。他告诫君主要注意防范，因为这其实是使君主埋下祸殃。

公平合理征税

管仲主张：“相地而衰征，理道之远近而致贡，通流财物粟米，无有滞留，使相归移也。”这里明确提出了国家征收贡赋不仅要考虑到土壤的肥瘠，而且还要考虑到被征地区离京都的远近，并且征收贡赋应不影响全国粮食、货物的流通，初步有了公平合理征税的思想。

孔子反对鲁国执政季康子“用田赋”的政策，主张恢复“周公之籍”。他对国家赋税的征收在具体措施上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想法：其一，国家征收赋税时，必须考虑到被征地区距离的远近、田地的肥瘠以及人丁的数量和年龄的老幼；其二，对于鳏寡孤疾，国家必须予以照顾，平时不征，有战争时才征；其三，征税按“井”为单位进行计算。

《管子》在征收赋税中则主张按财富消费累进交纳不同数量的租税，即财富多、消费大者多交，财富少、消费小者少交。如《管子·山国轨》主张大户人家重葬和修建豪华住宅要加重征收租税，小户人家薄葬和盖普通住房租税则少收。

用人谋略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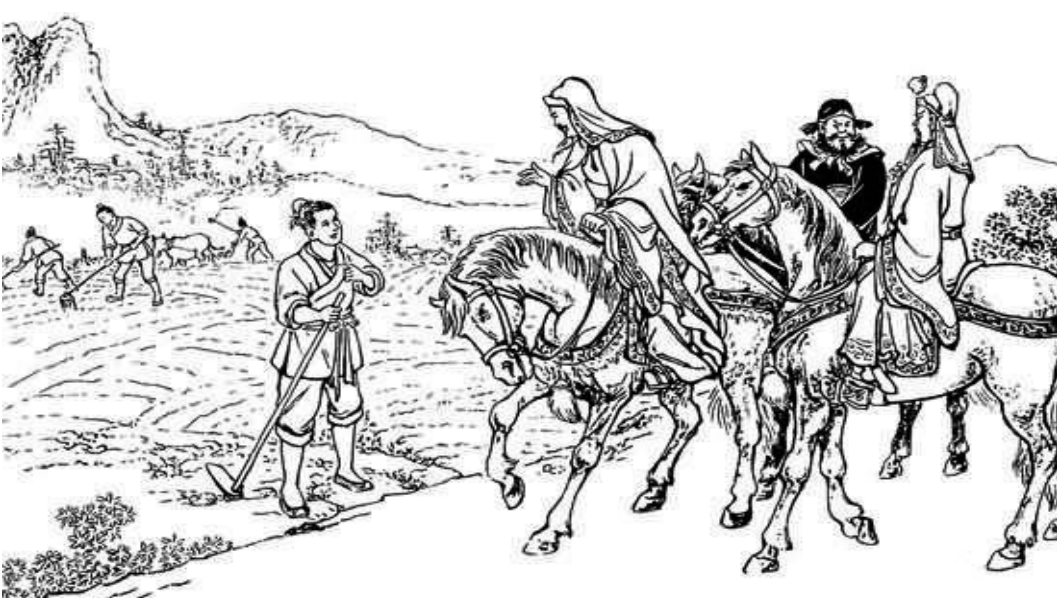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208年，曹操大军南下荆州，此时刘表去世，其子刘琮继任荆州牧，这年9月，刘琮就以荆州投降曹操。当时刘备驻军樊城，刘琮却不敢把投降之事告诉他。等到曹操已到宛城，刘备才获知投降之事。有人建议夺取荆州，刘备说：“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，背信自济，吾所不为，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！”于是率部下撤离，刘琮的亲信及荆州的人士多跟随刘备而去。到达当阳时，跟随者已达十多万，辎重车几千辆，每天只能走十多里。有人建议他火速行动，但刘备说：“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！”这句话，千载以下仍动人心扉。

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就此评论道：“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，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顾（刘表旧恩），则情感三军；恋赴义之士，则甘与同败。终济大业，不亦宜乎！”的确，刘备之能立，用人固是紧要，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爱民的本心。“行大道、民为本、利天下”，则民皆附之，而贤才焉能不闻而从之？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用人谋略的根本，正在于以民为本的大义。

当时，曹操亲率五千精骑急追，一天一夜行三百余里，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。刘备只好抱妻弃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人骑马逃走。张飞率二十骑断后，据水断桥，瞋目横矛：“我就是张翼德，有谁来决一死战！”此等英雄气概，唯刘备的人才唯能。正当此际，有人对刘备说“赵云已向北逃走”，刘备大怒，把手戟向那人扔过去说“赵子龙绝不会丢下我逃跑”，过了一会，赵云抱着刘备的儿子刘禅从乱军中杀出而归。此等忠心耿耿，唯刘备的人才唯能。袁涣是，关羽是，赵云亦是。曹操若是听闻赵云故事，只怕徒有欣美的份儿。

为人主者，不宜逞匹夫之勇

公元221年，汉中王刘备在成都西北的武担山之南登基称帝。益州事定，天下三分，刘备便为关羽被杀而深感耻



辱，准备进攻孙权。当时赵云劝谏：“国贼，曹操，非孙权也。”不能置曹操于不顾先和孙权开战，两国战端一开，不可能很快结束，这不是上策。这的确是良善之言。大臣中劝谏的人也很多，刘备全然不听，这年7月亲率各路大军进击孙权。当时，张飞正率兵与刘备的征讨大军到江州会合，却被其帐下将领张达、范疆杀害。刘关张的情谊非同一般，刘备又哪里听得进什么良善之言。正如当时魏国侍中刘晔所分析的：“关羽与备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。”刘备不出兵为关羽报仇，不合善始善终的礼义。然而诚然如是，以私恩加于国事之上，弃当时大势大局于不顾，则无异于逆势而动，其能成事者并不多见。

第二年，刘备从秭归出兵进攻东吴，治中从事黄权劝谏，考虑到顺江而下前进容易撤退困难，而请求派自己率军为前锋，刘备在后方坐镇。刘备不采纳，反而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，自己亲率将士，沿长江南岸翻山越岭向东吴进发，驻军猇亭。为人主者，不坐定中军，而身先士卒，勇气虽可嘉，却是匹夫之勇。最终在公元222年的闰六月，被东吴年轻将领陆逊以火攻而破，刘备败走白帝城。诸葛亮听闻消息感叹：如果法正仍然在世，一定能够阻止主公进攻东吴的行动；即使东下，也绝不会失败。杰出人才不够用，以致刘备此战所带贤能除黄权外别无所闻，更无深谙军事谋略之人，亦是其兵败原因之一。

白帝城托孤，彰显刘备之至真至诚

公元223年，刘备病重。他对诸葛亮说：你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，必定能安定国家，完成大业。如果刘禅还可以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如果他没有才德，你可取而代之。诸葛亮满着泪说：臣下怎敢不竭尽全力辅佐太子，必忠贞不二地为国效命，至死不渝。历史上对这段对话多有解读，或言刘备以此语试探，或言以此倒逼，而终得诸葛亮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承诺，但于刘备而言，亦未尝不是真如所想？刘备临终前更给太子下诏：“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。”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

白帝城托孤，彰显刘备用

以诚信得人

——刘备用人史话（下）

□ 陈家兴

人谋略之过人处，惟其至真至诚，方能令大贤如诸葛者尽忠以报。即便身逝，其所留下的贤才皆能忠心辅佐其子，“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”，使蜀汉存世40余年；而曹操之后，其重臣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有篡位之心，正所谓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，后即有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魏自立。

相形之下，不能不说刘备的用人谋略要胜曹操一筹。蜀汉的这40余年里，诸葛亮上表刘禅以“王业不偏安”自励，在主动出击中求得生存，先后有诸葛六出祁山、姜维九伐中原之举，更有蒋琬、费祎等贤能治内。从根本上讲，贤能之士不因刘禅庸弱而弃之，念的不正是刘备、诸葛亮的德能？

综观刘备一生，在豪杰云起的汉末终能成事，得贤才是关键原因。而贤能之士相对较少，以致不能尽展其志，则是一大憾事。

选人用人史话

（上接1版）

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。我们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反腐败战略思想，不仅要深刻领悟其思想精髓，而且要深刻把握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以绝对忠诚的使命担当，为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攻坚战、持久战贡献力量。

牢牢把握反腐败战略思想的根本立场。这个立场就是党的立场、人民的立场。我们要以绝对忠诚的坚定立场，不断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。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，自觉地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体现在一言一行中，体现在反腐执法中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，腐败分子往往是政

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交织，他们大搞权钱交易、利益输送，物欲和权欲形成了恶性循环。他们利用党和国家经济资源笼络人心、结党营私，恶化政治生态。我们要充分认识其动摇党的执政基础、危害国家政权安全的本质，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打击。要按照中央的要求，把办理中管干部案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。创新办案思路，明确办案责任，加快工作进度，高质量、高效率地办好每一起案件。

牢牢把握反腐败战略思想的基本观点。这个基本观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、维护人民利益、依纪依法反腐。坚持党的领导，就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，在要不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，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大原则，要不要坚持中

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，绝不能闪烁其词、语焉不详。对疑难问题、社会热点问题等，要坚持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提高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。维护人民利益，就要在国计民生、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态度坚决、措施到位，不断提高反腐执法的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依纪依法反腐，就是要以宪法和党章为基本遵循，秉持党纪与国法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、相互保障的反腐败法治方式，坚持纪在法前、纪法衔接，充分发挥党纪国法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治效应。始终坚持反腐败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，做到办案工作不放松、不停步、不手软；始终围绕构建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体制机制的基本战略，推动不敢腐向不能腐

和不想腐的转化。

牢牢把握反腐败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。这个基本方法就是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。把握治标与治本的辩证法，一要坚持以打促防、惩防并举的战略方针。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、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，坚决铲除腐败这个致命的“污染源”；以驰而不息的恒心和韧劲做到治标不松动，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。二要正确处理反腐败各要素间的重大关系。在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的问题上，认清前者是固本强基之举，后者是刮骨疗毒之策，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；在拍“苍蝇”和打“老虎”的问题上，认清只打“老虎”不拍“苍蝇”就会养痍遗患，只拍“苍蝇”不打“老虎”就会越反越腐；在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的问题上，认清前者是反

腐的基础，后者是反腐的关键；在国内反腐与境外反腐的问题上，认清反腐败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，切实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，决不让某些国家成为腐败分子的“避罪天堂”。三要及时总结并运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。充分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“巡视利剑”和“派驻全覆盖”等行之有效的措施；做到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，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，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，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，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、创造性和实效性。

牢牢把握反腐败战略思想的理论品格。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根本之策，我们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站

稳政治立场，坚定理想信念。执法办案中，以“输不起”的责任担当和秉公执法的浩然正气，高质量高效率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。中央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，是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，对构建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有效机制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有着重大现实意义。我们要以政治上的坚定笃行服从改革，以理论上的清醒自觉维护改革，从内心激发出充满无穷动力的责任担当，不折不扣抓谋划、抓落实、抓执行；一如既往地做好改革中应该做好的工作，努力营造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良好氛围，为建立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尽职尽责。